



Dr. James Menzies

and His Collections

of Chinese Art

明义士 和他的藏品

方辉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19/15

明明德序

受加拿大长老会的委派，我的父亲明义士于1910年前往豫北地区传教。在结束了一段时间的汉语培训后，他幸运地被派往安阳。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安阳靠近一个叫小屯的村子，商王朝的最后一个帝都——殷墟，就坐落在这里。当时，加拿大传教士们的工作主要是向教徒宣教，并兴办学校和医院。父亲早年曾系统地接受过土木工程学的训练，因此，对于那些保存在地面上的各种古代建筑物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且，他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取得传教的成功，就必须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给予更多的认识 and 了解。

在当时的西方，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诞生也不过才只有三十来年的时间。在安阳，得到有关考古学的书籍和杂志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他传教士对此并不感兴趣。父亲从北京和上海买来一些中国学者所写的书籍，这些书大多是关于甲骨文方面的。自1899年甲骨文被认识后，学术界认为这些甲骨的出处就在豫北地区。但对于这位偏处乡村的西方人来讲，他考虑更多的则是如何用科学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豫北地区发现的各类商周时期的文物。

围绕谁是殷墟的发现者，学者们已经费了不少的笔墨。我想

说的是，父亲于1914年在洹河岸边的小屯村识别出刻有文字的甲骨片，纯粹出于偶然。此后，他频繁地来往于小屯和驻地之间，记录自己所能看到的一切。到1917年春，父亲随“中国劳工团”赴法国前线前夕，他在上海出版了《殷墟卜辞》一书。书中的甲骨是他从自己的藏品中选出后亲自临摹的，并附有一篇自序。这时，他已经是一位具有一定水平的业余考古学者了。

1917~1920年的三年间，父亲在法国服役。其间，他曾利用休假的机会，到伦敦大英博物馆等地参观访问，学习有关古代艺术和考古学的知识。

1921年，父亲回到安阳，继续他的传教和对商周遗物的收藏、研究工作。1922年起，我进入卫辉的海外学校读书。学校放假的时候，我经常跟随父亲踏访殷墟遗址，他还常给我讲解采集的遗物的重要性，哪怕采集品只是一块农民田地里的碎陶片。

1927年春，北伐战争爆发。豫北地区英属侨民被迫撤往天津。我们也在撤退之列。这年的秋天，父亲被委派到设在北京的华北联合语言学校，教授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课程。这是一所专为那些来华年轻传教士和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开设的学校，学制为两年。在这里，他一边做研究工作，一边拓制从安阳带出的甲骨的拓本。此后，他的这些甲骨藏品便留在了该校。

1928年9月初，我们一家从天津出发，开始了一次环球旅行。这次的旅行费用全部是祖父提供的。我们在印度参观了一些佛教胜迹，然后辗转伊拉克，访问了乌尔、基什和巴比伦等考古圣地。从巴格达乘车穿越沙漠，到达大马士革；之后南下巴勒斯坦的拿撒勒和耶路撒冷。在那里，父亲应邀参加了由美国考古学家威廉姆·傅瑞德里克·贝德博士主持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发掘地点是一处靠近耶路撒冷、名字叫做 Tell En-Nasbeh 的遗址。他在那里工作了四个月，获得了科学发掘和记录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1930年秋，父母把我们三个孩子安置在日本神户的加拿大海

外寄宿学校，他们二人回到安阳。在我们离开中国的两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于1928年至1929年在殷墟小屯进行了考古发掘。这可能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待父亲回到安阳时，发掘工作已经结束，探方也已回填，但他后来对发掘报告给予了很多的关注。

1932年，父亲被齐鲁大学聘为考古学教授。他将自己在安阳的藏品用船载车拉，运到济南，并在校内办起了一个博物馆。齐鲁大学的教学都需用汉语。父亲先是开设了一门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课程，博物馆的藏品便发挥了作用。他还充分利用济南附近发现的古代遗址和古迹，教给学生们有关鉴定、断代和记录的方法。当然，甲骨学仍然是他研究和讲授的重点。他完成于1933年的讲义《甲骨研究》已于近年由齐鲁书社再版。

我相信，父亲在齐鲁大学四年多的教学生涯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充实、最为惬意的时期。那时的他刚刚50初头，在学术上风头正劲。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再工作上10年或15年，我想他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造诣。这期间，他发表了《中国早期的上帝观》一文，指出，商代的人们相信上帝为至上神。

父亲于1936年夏回国度假，本打算于第二年9月份开学前返校。回国之前，他将自己的藏品收拾好，集中存放在麦克卢尔医生的房子里。没有想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使一切发生了改变。加拿大联合教会海外传教协会面临变化了的新形势，推迟了回国休假传教士重返中国的计划，我的父母不得不继续滞留在国内。此前，父亲于1936年秋在多伦多大学注册攻读博士学位，并完成了必修课的选修，只等着回到齐鲁大学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在重返中国无望的情况下，他选择了留在多伦多，应聘到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做助理研究员，一边为该博物馆鉴定中国藏品，一边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

这里，我不准备历数父亲因为与博物馆东亚部负责人关系不

睦而遭受的种种不快和挫折。1942年，经过修订的毕业论文《商戈》终获通过，父亲获得博士学位。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父亲被美国国务院战时新闻局聘为中国问题专家赴旧金山任职，并于1945年转到华盛顿工作。不幸的是，1946年6月父亲两度遭受心脏病的打击，这使他战后重返中国的计划再次受挫。

在中国国内，此时则仍然处于战争状态。1947年夏，豫北差会被迫解散。我的二姐弗朗西丝和姐夫埃尔文从安阳转移到四川成都，我的大姐玛丽琏在上海服务于联合国世界学生救援组织，我则在首都渥太华担任加拿大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当时父亲仍在华盛顿养病。他几次给我写信，说起他是多么地希望回到中国，将自己的藏品郑重地捐赠给齐鲁大学。

但是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回到中国，而当时的济南，也已处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下。父亲的藏品被他的同事们重新装箱。其中的一箱有2390片甲骨，是他于1914年至1916年间在小屯收集的。这些甲骨的摹本曾发表于1917年出版的《殷墟卜辞》一书。但父亲认为当时的临摹存在不少错误，一直希望拓制后重新出版。他让我设法将这箱甲骨运到设在上海的加拿大总领馆，以避免因济南方面政权更迭而很容易出现的损毁。在我和尚在上海的姐姐玛丽琏的安排下，这箱甲骨后来被运到南京加拿大大使馆。1951年，由当时任加拿大临时代办的切斯特·朗宁在回国前交予南京博物院。

1948年春，解放军加强了对济南的包围。留在济南齐大校园内的百余箱文物藏品，一时竟不知如何处理。父亲写信给玛丽琏，让她告知学校当局，除了上文提到的那箱运往上海又转运到南京的甲骨外，其他藏品均交予校方处理。这些藏品后来被藏在外籍教师的地下室里。1948年9月25日，济南解放。1950年至1951年，在齐大的外籍教职工被勒令回国。1951年夏，时任齐大文学

院院长的林仰山先生向当局交出了一份关于藏品埋藏地点的地图。

在北京的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也于1949年10月宣告关闭。父亲存放在学校地下室内的20000余片甲骨和其他文物，共有两大箱，被转交到故宫博物院，直到1974年才在故宫的仓库内被意外发现。

我们在北戴河的家中，也存放有1927年以前从安阳运来的甲骨等藏品。后来，部分藏品被存放在天津英国租界内加拿大长老会的大本营中，因为这里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很多传教士都喜欢将自己的物品寄存在此。1947年，豫北差会被迫解散，传教士们被告知尽快清理他们留在天津大本营中的个人物品。因为父亲身在美国，未能及时得到这份通知。当获知这一消息后，他只要求将那个装有家信的红盒子带回加拿大，因为里面装有他们一家人的美好回忆。他请求将包括甲骨在内的文物藏品留在中国，并通过可靠的人运到济南齐鲁大学。但是，阴差阳错，因为通讯不畅，1948年5月，装有甲骨等藏品的六个箱子从天津港装船，于9月运抵多伦多。父亲从华盛顿指示我，这些箱子应当寄存在路灵森货仓内，因为他仍在期待着重返中国，并希望将这些藏品一同带往本该拥有它们的地方。

父母二人于1949年回到多伦多。父亲在顶楼特意辟出一间书房，里面堆满了有关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书籍和期刊。他还经常查看存放在路灵森货仓里的藏品。

遗憾的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此后出现的中西方的严重对立，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就此终止。父亲重返中国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我于1950年12月至1953年7月被派往日本工作。当我回国休假探望父母时，我发现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花很多的时间用在学术研究上。尽管如此，他仍然尽最大

努力，让自己赶上中国学术前进的步伐。1957年，父亲心脏病复发，永远离开了我们。如果有现在的医疗条件，他本应活得更长些。

父亲没有留下对自己藏品的处理意见。1957年8月31日，马来西亚宣布独立。我被加拿大政府任命为高级特派员赴马来西亚上任。1958年初就任前夕，我写信给父亲在美国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如何处理父亲留下的藏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建议我卖给美国的博物馆。当时，中国正值“大跃进”。我想，既然父亲的这一部分藏品已经来到了加拿大，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保存在加拿大。接下来，母亲和我就捐赠事宜同多伦多大学和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达成协议，我们将藏品捐赠给该博物馆，由博物馆方面出资设立“明义士基金”，金额为40000加元，主要用于：1. 出版父亲的博士论文《商戈》；2. 从台湾邀请学者对明义士藏品中未经著录的甲骨进行整理并出版；3. 对明义士的甲骨拓片进行整理并出版。母亲和我未从捐赠中获得任何经济上的利益。

1976年至1980年，我有幸出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为了不给当年父亲的好友添麻烦，我从未尝试与他们建立任何联系。我曾两次访问齐鲁大学的旧址，现在是山东医科大学的校园，但并没有提起父亲早年在此供职的事。我也曾两次到过安阳和小屯村，但当地的官员说他们对从前的外国传教士一无所知。

幸运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加两国的外交关系和学术交往的日益密切，两国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得到了加强。对于宋家珩教授和其他学者为促进中加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所作出的贡献，我感到钦佩，并表示祝贺。

我要特别感谢方辉博士。近年来他致力于明义士及其藏品的研究，这次又以《明义士和他的藏品》一书，向读者全面介绍了明义士由福音传教士成长为一名汉学家的过程。

1999年6月，我将父亲生前收集的三箱有关中国考古学的研

明明德序

究资料和图书捐赠给山东大学，以表示我个人对他们所作贡献的敬仰，并祝愿他们取得更大成绩。

明 明 德

2000年6月30日

(梁艳秋译、方辉校)

李学勤序

加拿大汉学家 James Mellon Menzies 博士，汉名明义士，字子宜。他的名字，几乎所有关心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的人都是知道的。他在 1914 年初春，“乘其羸老白马”，考察甲骨出土地点的故事，也在人们中间广泛流传。然而实际上，明义士博士的生平事迹，包括其学术活动及所作贡献的详情，真正详细了解的人不多。

明义士博士关于殷商文化与甲骨文的作品，在中国很不容易见到。他手摹的甲骨著录《殷墟卜辞》，1917 年于上海出版，久已成为珍本。只有书的序言，有译文登在 1928 年《东方杂志》上，为人辗转引用。他的甲骨拓本著录《殷墟卜辞后编》，虽在 1928 年编成，但长期未能付印，到 1972 年才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1933 年他在齐鲁大学的石印讲义《甲骨研究》，传世极罕，1996 年始有影印本正式发行。至于明义士归国后，1942 年取得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商戈》，中国学者读过的便更少了。无怪乎有关他的传闻，每每有误解失实之处。

我在 50 年代初读过《殷墟卜辞》，并在北京图书馆见到当时管理馆藏金石书籍的曾毅公先生。曾先生自 20 年代末任明义士的助手，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明氏回加拿大，始自齐鲁大学奔走返京。我从曾先生那里听到过不少明义士的轶事，又曾合作将《殷

墟卜辞后编》编入拟议中的《甲骨文据》。此后，我一直注意明义士博士的论著。1996年，访问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终于有机会目见明氏的主要珍藏。

明义士博士是外国最重要的甲骨藏家之一。他收藏甲骨，是在他作为长老会传教士驻理安阳（当时称彰德府）的时期。从其哲嗣前任驻华大使明明德（Arthur Menzies）先生为《甲骨研究》影印版所撰序言知道，明氏在安阳的时间共有三段，即1914年至1916年、1921年至1927年和1930年至1932年。由于1928年殷墟发掘业已开始，他对甲骨的收集应主要在前两段期间。《甲骨研究》自述：“1924年，余有疾一月，才好了。小屯人打墙，发现一坑甲骨，为余所得，其中有大的。1927、1928二年间拓本成，即《殷墟卜辞后编》。”这一坑甲骨，是明氏藏品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1936年，明义士博士返国休假，后因战火而不能重返中国。现在我们知道，现藏加拿大的明义士藏品，包括甲骨、拓片和其他文物，是其原藏于天津的部分，于1948年秋被运抵多伦多。他去世后，由他的家人捐赠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经该馆许进雄先生整理，于1971年、1977年出版为《明义士收藏甲骨》一书。前面说到的《后编》艺文印书馆本，用的也是该馆所藏拓本。《殷墟卜辞》的部分，当时他存放在南京加拿大使馆，1951年交南京博物院保存。另外又有一部分埋藏在齐鲁大学校园内，位置图由代校长林仰山（F. S. Drake）保管。1952年林氏离华，将图交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将藏品掘出，“其中有甲骨八千余片，大多数是小片、碎片和无字甲骨”，材料已选辑入1998年出版的《山东省博物馆珍藏甲骨墨拓集》。

明义士博士还曾藏有一片人头骨刻辞，有“夷方伯”等字，曾发表于《齐大季刊》，极为珍异。原物据说现在台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这样丰富的藏品基础上，明义士对甲骨研究创获颇多，对

殷商世系的探讨尤有见地，在甲骨学界早有公论。我认为，他的特殊贡献还在甲骨分期的探索上，其成果见于他的文稿《殷墟卜辞后编序》。

《殷墟卜辞后编序》不见于艺文印书馆版的《后编》。50年代我看到的这一序稿，是曾毅公先生从英文翻译的，写在几页白纸上，没有完篇，末尾赘有一些零散的文字，不能通读。那时我用笔记本抄录下来，幸能在“文革”中存留，1981年将之在《文物》上发表。

读《后编序》，可知明义士博士非常重视1924年小屯村中出土的那坑甲骨（实均为卜骨）。他把《后编》的材料，先按卜辞内容分作“田猎、游行之事”与“祭祀之事”两类。对“祭祀”一类，根据辞中称谓，分别“时代之先后”，“区之为二”，称为“甲屈”和“丙屈”，推断“甲屈”有的“为武丁后半期所卜者”，有的“可决属于祖庚时代”，“丙屈”则分属祖甲至武乙时。现在看来，明义士所分“甲屈”即近年分期理论的历组卜辞，“丙屈”则包括新分期理论的无名组卜辞。他的分期论断，已为70年代以后好多学者的工作所证实。不管他在1933年读到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后与否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总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方辉博士对考古学、古代史都深有研究，明义士的《甲骨研究》便是经他的努力得到正式出版的。他还前往加拿大，在明义士博士亲属的支持下，详尽深入地研究了明氏的学术生涯和珍藏文物，著成这部《明义士和他的藏品》，对于甲骨学史与国际汉学史作出贡献，也有益于中加两国文化交流关系的发展。特写此小序，以为推荐。

李学勤

2000年7月16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

王宇信序

方辉教授《明义士和他的藏品》一书完成，承蒙厚爱，嘱我写一篇小序。我不揣冒昧，表示乐于完成此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认为这是第一部全面介绍西方甲骨学家贡献的专著，因而较为重要。本书把一位热心追求中国古代文明、全身心地投入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诚实学者的一生再现出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一百多年来的甲骨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并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国际性学问。1999年8月在河南安阳召开的“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60多位海外权威学者与国内100多位殷商文化著名学者聚首殷墟，就一百年来甲骨学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和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就说明甲骨学研究的国际性。我们曾经说过，正是几代国内外优秀学者的努力，才取得了今日甲骨学研究的百年辉煌。加拿大学者明义士自1910年25岁时被派驻中国彰德一带传教，是被博大精深的中国殷商文明所折服的外国学者中的较早者。不宁唯是，就中国当时的学者而言，罗振玉先生1908年才从古董商口中了解到甲骨文确切出土地是安阳小屯村，直到1915年他才亲自踏访殷墟，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而明义士以驻安阳传教之

便，近水楼台，自1914年起就在小屯村收集甲骨文和其他古代文物，先后收集甲骨达5万片，成为一位最大的甲骨收藏家。与此同时，他还及时公布甲骨材料，以供学术界研究。他1917年出版的《殷墟卜辞》、1935年出版的《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等，有不少重要材料。而明氏逝世后，由许进雄教授整理出版的收藏专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明义士收藏甲骨》和《殷墟卜辞后编》，更为学者所熟知。明义士在甲骨文辨伪方面也取得了成绩。虽然他早年疏于此道，但经过悉心考索，终于成为甲骨文辨伪的行家里手。一些外国人的收藏，诸如《金璋氏所藏甲骨卜辞》等，经过他的慧眼，较《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收入的伪片就少了许多；为了研究的去粗取精，他还对校核著录书中的重见片作出了努力。1933年出版的《表校新旧版〈殷墟书契前编〉并记所得之新材料》，就是专门的校重之作。不仅如此，他的殷墟青铜器收藏和研究也取得了成就，直到晚年，还以《商戈》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如此等等，明义士在甲骨学研究的“草创时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

就是在近代，考古学方法引入到了甲骨学研究领域，甲骨学大师董作宾手执锄铲，掷蹄洹滨，从殷墟的地下“挖出”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方法。而另一位甲骨学大师郭沫若在亡命日本的艰苦环境下，“爱将金玉，自砺坚贞”。虽然未身亲殷墟考古，却从米海里斯《美术考古一世纪》中获得考古学方法的启示，使他的甲骨学研究高屋建瓴。郭沫若与董作宾殊途同归，凿破了甲骨文晚商273年的“一团混沌”。但是，明义士也基本上与他们同时，创造性地以考古学方法探索甲骨文分期断代，并取得了成绩。遗憾的是，他的这一重大贡献却一直被人们遗忘了，这是十分不公正的。明义士甲骨文分期断代的考古类型学考察，给了分期断代文字演进“两系说”以深刻的影响。而“历组卜辞”时间前提的争论，应肇始于明义士。关于此，我们在《甲骨学一百年》第

135 页至 136 页，曾专论明义士接受近代考古学的方法和实践，并指出：明义士“在整理甲骨文时代时，已经引入了近代考古类型学的手段”；“明义士最早用‘字型’，即考古类型学方法进行分期断代，就不是偶然的了”。因此，可以说，明义士的研究不仅为甲骨学的“草创时期”作出了贡献，而且推动了甲骨学由“草创时期”向“发展时期”前进的步伐。

对于学者们来说，明义士的研究及其成就，还难免有被忽略和遗漏之处。而对一般读者而言，除了知道明义士骑一匹老白马徘徊在小屯村购买甲骨受骗上当的小插曲以外，其他的更是不甚了了。因此，出版一部《明义士和他的藏品》专著，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它不仅可以使我们全面而科学地认识明义士的追求及其对甲骨学研究的贡献，从而使我们在新世纪再创甲骨学研究辉煌受到启迪，而且也是我们表达对那些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为弘扬中国古代文明作出过成就的外国学者的怀念与尊敬的最好方式。

方辉教授所著《明义士和他的藏品》一书，为甲骨学史上有贡献的海外学者研究专著的出版开了个好头。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这类著作出版！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那些为弘扬中华文明作出贡献的朋友们的！

王宇信

2000 年 5 月 15 日于

北京方庄之“入廉青小庐”

前 言

随着中国和加拿大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加拿大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近年来受到中加双方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自 90 年代初，山东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把对加拿大来华传教士的研究当作一个重点课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引起两国学术界的好评。

自 1993 年以来，受山东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宋家珩教授的委托，我承担起对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进行研究的学术课题。对于明义士其人，从事历史和考古学研究的人并不陌生：他 1910 年来华，在河南安阳地区传教，得地利之便，收求到大量甲骨，并成为研究甲骨文的专家，后来到齐鲁大学任教。1936 年回国时他将大批文物藏品携带回加拿大，其他未来得及运走的文物在解放后被发现，现藏山东省博物馆。这是读者从国内的出版物中所能得到的对明义士的一般认识。我在 1994 年 1 月发表《明义士在华期间的文物收藏和甲骨学研究》一文时，也基本上是这样认识水平。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由浅及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具

体到对明义士的研究，也是如此。几年来，我通过到山东省档案馆查找齐鲁大学档案，拜访当年明义士教授过的学生，去山东省博物馆查看明义士藏品档案等，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994年和1997年，我先后两次访问加拿大，到明义士学习和工作过的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等地搜集资料，并到渥太华明义士之子明明德先生家中采访。工作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这期间，我收集到大量当事人及与当事人有关人员的信函、手稿、日记和照片等资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小书，就是以这些第一手资料为基本素材的。

本书共七章，对主人公一生的活动进行了论述。归纳起来，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明义士的收藏活动。资料表明，明义士最初迷恋于甲骨的收藏，并进而将收藏领域扩大到其他文物，源自他在甲骨上发现了有关“上帝”的记载。他把这一发现看作是“上帝”的启示。由此，他转入对甲骨文和中国早期宗教的研究，试图寻找到中国文化的“根”。二是明义士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贡献。明氏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甲骨学和商代青铜文化两个领域。对于明义士的甲骨学研究，大家比较熟悉；而对于明氏回国以后所作的有关商代青铜文化的研究，因种种原因，国内学者了解得则相对较少。本书对此作了重点研究。可以看到，尽管明义士没有受过正规的考古学训练，阅读中文文献、尤其是中国古典文献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在考古学上却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加上自己的勤奋、刻苦，终于成为在上述领域知名的考古学家。三是比较敏感的明义士藏品问题。有证据表明，明义士藏品被运往国外，并非出自明义士的本意。他曾经明确表示，把自己的藏品捐赠给齐鲁大学。然而，事与愿违，因为他本人无法控制的原因，他在天津的藏品最终还是于1948年9月被运到加拿大。作为一位学者，明义士是有着自己的收藏宗旨的，那就是不为赢利而收藏。考察其一生的收藏活动，明义士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明义士究

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信读者会从中得出自己的看法。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贵在实事求是。在对明义士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中，笔者是秉承了这一宗旨的。本书第七章，从明义士青铜器藏品中选出部分重要标本加以介绍，主要是为国内同行提供一些不易看到的资料，相信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宋家珩教授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鼓励。如果没有她的信任和荐举，就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明明德 (Arthur Menzies) 先生以其 80 多岁的高龄，在我两次采访期间，都给予了全力帮助；尤其难得的是，明明德先生将其父亲生前收藏的拓片、手稿、日记、信函和部分图书捐赠我校，极大地方便了本课题的进展。正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董林夫先生近年来也从事对明义士的研究。在加期间，我们两人交流意见，切磋研究心得，使我获益匪浅。对于上述各位的无私帮助，我谨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山东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制定了一个出版“枫叶丛书”的计划，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加拿大研究方面的专著，迄今已出版了七部：（一）宋家珩著《枫叶国都——加拿大的过去与现在》，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二）郭继德著《加拿大文学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三）宋家珩、董林夫著《中国与加拿大——中加关系的历史回顾》，齐鲁书社 1993 年版；（四）宋家珩、李巍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五）宋家珩主编《加拿大人在中国》，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六）郭继德著《加拿大英语戏剧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七）宋家珩、李巍、徐乃力主编《加拿大与亚太地区关系》，济南出版社 2000 年版。本书是“枫叶丛书”的第八部。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科技处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连琪基金会的资助。何琳达 (Linda Hershkovitz) 女士和乐静宜 (Gilliane Lapointe) 女士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加拿大